

论『五四』新文学

刘纳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论“五四”新文学

刘 纳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五四”新文学 / 刘纳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新人文论丛书书目)
ISBN 978-7-5675-2549-8

I. ① 论… II. ① 刘… III. ① 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 IV. ①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7130 号



总策划 李庆西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静 陈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 × 1240 32 开
印张 9.25
字数 188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549-8/I · 1256
定价 36.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轫，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前 言

以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中心，形成了光辉的历史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是我们几千年民族生活中最美好的刹那，是“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猛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①。它给我们这个苦难的古老民族带来新生的希望，它成为历史的里程碑。

“五四”，这块历史的里程碑，包涵着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的意义，而首先，它是文学变革的里程碑。

那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时代。“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②。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③，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内在更深入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它不但显示着民族振兴的希望，而且，成为了民族进步的先导。它负载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痛苦，永远为那伟大的时代作证。

“五四”新文学自觉地担负起了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文学自身的责任。它的宽广的艺术胸襟和光辉的艺术理想，它的蓬勃的生命内

① 郭沫若：《文学革命的回顾》，《文艺讲座》第1册第78页，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② 茅盾：《读〈倪焕之〉》，《茅盾论创作》第2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

容和突入人们心灵的深度，它所反映的我国进步知识界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标尺的变动，都说明了它的全新的文学素质。

“五四”新文学昭示了新的人生理想，它吸引了一代知识青年，即使并不具有文学气质的青年。“五四”新文学的冲决一切罗网，追求自由和进步的精神，照耀着几代人生命的途程。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五四”新文学作家留下了自己作为精神开拓者的足迹。

“五四”新文学实现了文体大解放和诗体大解放，建立起新的文学格局。那是开放的、多样的文学格局。定型化的模式被抛弃了，文学形式有了很大的变通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变得生动而有活力。

“五四”新文学，表现了多方面的特质，包含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它显示出豁达开阔的成年胸襟，它留下千古不凋的青春风采，同时，它又洋溢着新鲜诱人的童年气息。它焕发着现实主义精神，它激荡着浪漫主义波涛，同时，它又吸收着多种创作方法的因素。它是理性的，同时，它又是感情的。它是深刻的，同时，它又是幼稚的。……因此，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甚至互相对立的角度研究“五四”新文学，却都能有所收获。

新文学诞生得如此迅速，它把一大批作者推上文学舞台。在“五四”时期投身文学事业的年轻的作者们，大多缺乏从事创作活动的足够的准备。喷薄着艺术热情，却缺少艺术识见。今天我们看到的“五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刚刚翹望生活的年轻人的文学尝试，他们的艺术才华刚刚开始发荣滋长。作为一个个孤立的文学人物，他们的成就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五四”作家群，他们支撑起了崭新的文学世界，而且，获得了进入文学历史的资格。

应该庆幸的是，“五四”有天才的、已经在沉默中深思了十年的鲁迅，“五四”有天才的、正焕发着充沛的艺术创造力的郭沫若。

法国文学史家泰纳说：

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①

在“五四”时期，鲁迅，还有郭沫若，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于是，“五四”新文学中，有了两座高高矗立着的文学山峰：《呐喊》和《女神》。《呐喊》的深度与《女神》的力度，不但令同时代人无从步趋、无从仿效，而且，至今难说有人可以企及。

“五四”新文学缺少的是广度，是浩瀚。尽管当时最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沈雁冰十分向往和极力提倡艺术主题的广阔性，“五四”新文学作品中，仍然没有庞大的艺术构思，少有辽远的境界和雄伟的气象。当“五四”新文学以它特有的热情姿态，投入正在前进的历史洪流，它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也受到时代的限制。

“五四”新文学，置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明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里。作为源远流长的祖国文学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显示了惊人的爆发的力量。无论在多少个世纪之后，无论中国文

① 泰纳：《英国文学史》，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3—34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学还会有我们今天难以预料的怎样的发展、变革、腾飞，这都是一块巨大的里程碑。距离它的年代越久远，人们越能充分估计它的意义。

“五四”新文学，置于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舞台上。在世界文学正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世纪前叶，中国新文学的崛起是不容忽视的、伟大的文学现象。它反映着中华民族在精神生活方面与人类其他民族共同前进的强烈愿望，它向人类奉献出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伟大民族作家——鲁迅。

我们今天文学中的一切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的文学史揭开新篇章，我们的作家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时候，都能从“五四”文学的历史经验中获得裨益。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论文，便是试图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经验。

目 录

前 言 1

“五四”初期新文学作品中的“童心”美 1

“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 26

“五四”小说创作方法的发展 53

“五四”时期的两大作家群

——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作家性格比较 95

外国文学对我国“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影响 134

鲁迅前期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169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187

附 录 211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213

后 记 263

再版后记：回望与反省 267

“五四”初期新文学作品中的“童心”美

我们这个伟大的古老民族也有过童年，那无思无虑、天真美丽的童年。但是，它很少在古典文学中得到表现。回溯祖国文学光辉的源头，即使在我们民族最初的文学作品《诗经》里，也难见到纯真的童年气息。老子教人“专气致弱如婴儿”，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他们的文字，并不显露天真，而是放射着成熟的睿智的光芒。

在古代中国，没人把孩子当回事儿。他们只被看做“缩小的成人”^①，“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②封建社会扼杀着儿童的天性，它容不下小小的“童心”。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孩子，极少出现以孩子为主人公的作品。

十六世纪时，以异端自居的杰出思想家李贽，曾高唱“童心”的颂歌。十八世纪时，著名诗人袁枚主张以“赤子之心”“直抒性情”。从李贽到袁枚，给从晚明到清中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清

①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②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号。

新之气，他们被“五四”时期某些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引为同调，不是偶然的。但是，他们和他们追随者的诗文，不过比较自然，有个性，少做作罢了，哪里看得到真正的“童心”、“赤子之心”？古老中国的诗人、作家，被紧锁在皇权、家族的链条里，根本不可能用孩子般明澈的目光去看待人生，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早就泯灭了他们的“童心”、“赤子之心”！

站在十九、二十世纪交界线上的卓越人物梁启超曾经热情呼唤“少年中国”，憧憬着“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①的民族的新生。然而，只是到了“五四”，在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古老的祖国，才有了“返老还童”的希望，我们古老的文学，突然焕发出一派勃勃生机。

“五四”时代的审美心理十分开放。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进步的人们表现了与中国传统美学意境迥然不同的崭新的艺术趣味。他们追求、提倡、创造了冷峻、深沉、悲郁的美，如鲁迅的小说；他们追求、提倡、创造了充满英雄气度的美，如郭沫若的诗歌；……同时，他们也追求、提倡、创造了清澄、明澈的“童心”美。

“五四”新文学，从鲁迅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开始。“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声音荡人心旌，像飓

①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风，旋卷过苦难的祖国大地。

在我们第一批新文学作者的心目中，孩子，是“将来的‘人’的萌芽”^①，他们应该有健康、幸福、合理的新生活，他们的天性应该能够得到舒展、自然的发展，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爱护、关怀和尊重。新文学作者们指出：“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②。“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③而鲁迅，发出了更为无私、更为豪迈的呼唤：“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④“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⑤这些，代表着时代的见解。

从这样的时代见解出发，“五四”初期的新文学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牵动着他们的情思，引起了他们由衷的羡慕之情。在他们笔下，出现了那么多献给孩子的真诚的赞歌。

冰心写道：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⑥

①⑤ 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② 叶圣陶：《文艺谈三十九》，原载《晨报副刊》，见《叶圣陶论创作》第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郭沫若：《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④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⑥ 冰心：《可爱的》，原载《晨报副刊》，见《全集自序》。